

• 苏区研究 •

# 土地革命时期鄂东南根据地 群众路线的实践研究<sup>\*</sup>

吴擎华, 胡扬磊

(湖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黄石 435000)

**摘要:**作为湘鄂赣根据地的核心区,鄂东南根据地虽成立较晚,但却凭借对群众路线的灵活运用,成为湘鄂赣根据地最为稳固的战略后方。在革命进程中,鄂东南苏区党组织通过建立良好的党群关系,引导群众参加革命;发展地方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重视群众教育,塑造人民的革命理念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赢得了群众的高度认可,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快速发展,为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这一实践路径验证了群众路线在革命动员中的有效性,为理解中国革命的社会根基提供了典型范例。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群众路线;鄂东南根据地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7659(2025)04—0037—08

“群众”一词具有深刻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含义,它通常指广大的劳动阶层,涵盖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群体。群众路线是指“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又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之本、长盛不衰之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从未停止对群众路线的探索与实践。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sup>[1]</sup>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总结攻打茶陵经验时明确提出工农革命军的三项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sup>[2]</sup>鄂东南根据地作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其成功的群众工作得到了认可。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称赞鄂东南地区的群众工作:“湘鄂赣边区阳新县的一些地方,……那里的同志们都有进步的工作,同样值得我们大家称赞。”<sup>[3]</sup><sup>140</sup>目前学术界关于革命根据地群众路线的政治实践已形成多维阐释框架,<sup>①</sup>但对鄂东南根据地群众路线的实际探索与学术研究仍显不足。本文分析鄂东南根据地群众路线的具体应用和社会反响,为了解党早期群众路线提供更多案例和理论视角。

## 一、鄂东南根据地的社会情况分析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革命形势面临极大挑战。中共中央于1927年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上重新制定了革命策略,批评以往保护小地主利益的政策,并强调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必要性。此外提出了湖北地区秋收起义的战略目标,要求湖北地区的秋收起义需要在“政治上给现统治者一个扰乱,使其不能稳定,牵制其对江西压迫;经济上实行四抗(租,税,捐,粮)”。<sup>[4]</sup>1927年至1929年,鄂南区和鄂东区先后爆发了秋收起义,在此基础上红五军的多次军事行动,成功创建了以阳新、大冶、鄂城、通山为核心的鄂东南革命根据地。

\* 收稿日期:2024—03—18

DOI:10.13698/j.cnki.cn36-1346/c.2025.04.006

基金项目:湖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2025Y053)

作者简介:吴擎华(1976—),男,湖北通山人,湖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胡扬磊(1998—),男,山东日照人,湖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引文格式:吴擎华,胡扬磊.土地革命时期鄂东南根据地群众路线的实践研究[J].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25,46(4):37—44.

① 学术界关于革命根据地群众路线政治实践的研究,呈现出较为零碎的状态。尽管许多论文均有涉及,但直接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文献并不多,主要参见王员、孙平芬:《中国共产党新农村建设的经验与当代价值——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例》,《江西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袁志学:《党的群众路线在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实践》,《军事历史研究》,2013年,第27卷,第3期;王先明、孙启正:《土地改革中“群众路线”的实践与调适——以华北根据地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4卷,第5期;王建华:《群众路线:民主的中国路径——以陕甘宁边区为个案》,《人文杂志》,2008年,第6期;王欣媛:《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实现路径》,《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35卷,第1期。

土地革命初期,社会经济结构的剧烈分化,使底层农民和工人的生活十分悲惨。以阳新县为例,“1929年,雇农占10%,佃农占20%,半自耕农占30%,自耕农占30%,地主、富农占10%。”<sup>[5]168</sup> 这种社会结构说明大多数农民处于经济边缘状态,生活贫困,而地主和富农则掌握大量财富。同时,国民党通过加重苛捐杂税和各种罚款对农民进行经济压迫,包括“苛捐杂税(如牙帖捐、屠宰捐、烟酒捐、印花捐、团防捐、户捐、门牌捐、枪枝捐、电杆捐、特别捐、验契捐、编遣费捐等等)有加无已”。<sup>①</sup> 豪绅地主更加疯狂,“参加过农民协会的每人‘罚款’一至五百串,名为‘罚党’。……阳新县大箕铺地区三个姓曹的土豪劣种,借口农民烧毁了他们的家谱,强迫四个办过农民协会的农民赔钱一千余串。……花犹树地区一个村子三家姓杨的农民,共欠一个姓徐的地主九十串钱,原来已经还清,革命高潮时,地主藏起帐簿,这时地主又拿出帐簿来向三户农民追索本利,使得这三户农民倾家荡产。”<sup>②</sup> 农民日渐贫苦的同时,工人的生活条件也极为残酷。国民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发布的《告诫工人书》中强调工人应“忍现在之牺牲,得未来之幸福、……故凡我工友必须切实猛省、不可贪目前之享受而辜负从前祖宗创业之辛劳。”<sup>[6]</sup> 而实际上却剥夺了他们最基本的权利,在阳新龙港地区,工人工资显著降低,普通手工业工人和店铺工人的月工资仅约一串。童工无工资,服侍老板娘稍不如意要挨打挨骂。工人日常工作超过12小时,辛勤劳动却收入微薄,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当时流传歌谣:工人吃苦真难当,自从进工场,手劳足也忙。资本家虐待我,对我似豺狼。上难供父母,下难养儿郎。<sup>③</sup> 这一切都反映了土地革命时期底层群众的极端困苦。

为维护统治地位,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白色恐怖”政策。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鄂军第一师师长夏斗寅宣布叛变,提出“以武力清党反共,重建新政”<sup>[7]202</sup> 的口号。夏斗寅叛变导致湖北混乱,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关键时刻的介入,成功抗击并克服叛军。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城市反革命行动开始表面化,叛军迅速同右派军人等合作,大肆捕杀共产党人。“通山反动县长鲁秉城逮捕杀害共产党员、县农协负责人黄中色、郑芝藩、夏文杰等8人,随后又将妇女协会负责人王双庆、阮文秀、郑静珍等衣服剥下,赤身裸体殴打游行。”<sup>[7]207</sup> 1927年9月,大冶县伪县长李监堂上任,上任后“在县城内一次惨杀农民28人。全县群众对李匪无不切齿痛恨,骂他为‘李屠夫’。”<sup>④</sup> 此外,地主劣绅组建“清乡会”“铲共团”“民团”等组织,捣毁各地党组织、农民协会。仅据阳新一县统计,“1929年,县民遭铲共团屠杀及被迫外逃者近10万人,劳力损失惨重。”<sup>[5]171</sup>

这种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加剧了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激化人民群众与地主、资产阶级的矛盾,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的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要到来。”<sup>[3]101-102</sup> 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建立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维护工农利益的正确性,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 二、鄂东南革命根据地共产党“群众路线”理论的实践

鄂东南根据地的群众路线实践体现了其深刻的群众观念和扎根人民的工作策略。这一路线侧重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通过改进党的工作方式、加强宣传教育和建立群众组织等措施,鄂东南党组织确保了革命根据地的稳定发展。在经济生活方面,通过实施经济政策、优化营商环境和打击地主豪绅等措施,鄂东南根据地为群众创造了更好的生活条件,提高了群众的革命热情。

### (一)政治实践中的群众路线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群众路线的探索到达了关键时刻。尽管该时期的群众路线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理论体系,但其重要性已在理论探索和政策制定等方面初步显现。在鄂东南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后,蕴含群众路线精神的政策被逐步提出。这些政策加强了党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系,从而巩固了革命政权的稳定。

#### 1. 改进群众工作,拉近群众关系

土地革命初期,为扩大群众斗争的规模并增加建立革命根据地政权的可能性,中共鄂东特委提出了扩大群众基础并加强党员与群众之间联系的要求。在总结以往党的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为改造党的组织,

①②④ 湖北省革命史资料编写组:《党在湖北地区革命斗争史资料:第四分册》,内部资料,1961年版,第3页、第4页、第2页。

③ 鄂东南党史编写小组:《党在鄂东南地区革命斗争史》,内部资料,1986年版,第11页。

必须使每个党员都参加党的工作,都到群众中去活动,都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一员。……必须到工农群众中去建立深厚的基础,改变党的成分,特别要注意于大冶产业工人和各城市的店员与手工业者。……必须自支部改组起,由下而上的彻底改造,并提拔勇敢坚决忠实的工农分子参加指导机关。”<sup>①</sup>此外,“建立并充实群众组织,在群众组织中建立党团,起党团作用。”<sup>②</sup>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指导下,鄂东南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并进一步推动群众工作的开展。1930年年末,随着红军军事行动的胜利,革命成果进一步扩大。在攻占通山县城后,举行6000多人的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宗旨和政策、打开反动政府“义仓”,把粮食分给贫苦群众、建立公开、半公开的民主政权等群众团体、农村实行“减租减息”、在通山等基础较好的县开展斗土豪、分田地的斗争。<sup>③</sup>在1931年10月《鄂东组织决议草案提纲》中,对群众工作中要求“实行党员群众化、职业化与党员登记,……加强党团工作,健全党团领导,纠正过去党团不正确关系,建立党与群众组织的联系。”<sup>④</sup>政策的调整加深了苏区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在逐渐深化对群众路线的理解的背景下,鄂东南地区的党组织积极改进了群众工作方式,增强了与广大群众的联系,使群众逐渐理解到党始终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一边,致力于捍卫他们的利益。而这种策略也提升了群众对革命活动的热情,促使各个年龄和性别的人群都积极支持赤色政权。

## 2. 加强舆论宣传,引导群众革命

舆论工作在传播党的政策与理念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鄂东南根据地的舆论传播主要通过口号、标语为主,报纸宣传为辅实现。这些活动主要由党委宣传部或政府文化部门负责策划和执行,其内容严格遵循党的指导原则,具有明确的纪律性、时效性和地域性。总体上分析,鄂东南根据地时期所采用的革命标语主要可归类为五种类型:宣传鼓舞型、揭露敌人罪行型、公告制约型、理论知识型及历史纪念型。这一时期,“宣传品以传单标语为多,标语以党的政纲为多”。<sup>⑤</sup>以阳新地区为例,从1928年5月至1933年1月,阳新县共发布了13种报刊,包括《党声》《无情斧》《铁锤》等。<sup>[5]713</sup>宣传口号方面,鄂东南根据地红军创造了“标语钢印”<sup>[8]569</sup>进行政治宣传,如“击破敌人进攻新企图”<sup>[8]568</sup>和大冶县农民委员会发布的“五一国际劳动纪念宣传大纲”<sup>[8]565</sup>等。鄂东南党组织的舆论宣传工作,突破了地域的限制,提高了群众对党基本政策的理解,这为构建党的权威形象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 3. 推进法治建设,维护群众利益

法律制度在群众路线中起到桥梁和保障作用,为革命政权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确保群众利益和权利在法律框架内得到维护。鄂东南根据地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法令草案的指导下,坚决执行《劳动法》等法律法规。对于《劳动法》,鄂东南苏维埃明确提出:“坚决执行《劳动保护法》,实际改善工人生活,但须有明确的阶级路线。非工人成份,不得享受劳动保护法的权利。”<sup>⑥</sup>针对工人失业问题,苏区政府设立劳动失业介绍所救济失业工人。在婚姻法方面,苏区政府致力于正确执行婚姻法,成立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保证妇女特殊利益,及时制定并解释婚姻法,确保妇女群众理解与支持,强调苏区内群众结婚和离婚必须在乡苏进行登记,未经登记的婚姻或离婚,法律不予保障。<sup>⑦</sup>

同时,鄂东南苏维埃政府建立了一套庭审制度,确保法规的有效实施,以阳新县为例,1931年10月全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规定审判工作必须实施四项制度:公开审理制,允许群众旁听并在审判人员许可下发表意见;证据制,要求有确凿证据和审讯材料,禁止单凭供词判决;裁判委员会裁判制,作为司法最高权力机构,需政保执行科长参与合议,判决后公开宣布;群众监督审判制,适用于特殊案件,需在执行前公布犯罪事实,征求群众意见,如有异议,邀请群众代表参与再议。<sup>[5]577</sup>并规定“刑事案件,一般执行4种刑罚:处死、罚苦工、管制、罚款。……民事案件主要是婚姻、财产、一般斗殴、邻里纠纷等,……处理原则是:说服教育,调解为主。如当事人不服调解便判决。判决结果,口头宣布,不下法律文书,当事人亦不得上诉。”<sup>[5]578</sup>在鄂东南根据地,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结合内部的社会特点,政府建立了允许群众参与法律审判的制度体系,这些制度不仅有效保障了群众的知情权,还增强了群众对革命政权的信任。

## (二) 经济生活中的群众路线

在鄂东南根据地,经济政策的实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核心宗旨: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①② 中央档案馆,湖北档案馆:《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特委文件):一九二七年—一九三四年》,内部资料,1985年版,第38页、第39页。

③ 湖北省革命史资料编写组:《党在湖北地区革命斗争史资料:第四分册》,内部资料,1961年版,第37页。

④⑥⑦ 中共咸宁地委党史办公室:《鄂南党史文献资料:第二辑》,内部资料,1987年版,第319页、第540页、第541页。

⑤ 中共咸宁地委党史办公室:《鄂南党史文献资料:第一辑》,内部资料,1987年版,第287页。



通过经济市场的政策干预和宏观调控,该地区党组织不仅为群众创造了优越的生活条件,而且为革命政权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经济基础,这些措施进一步促进了苏区经济的发展与稳定。

### 1. 发展商业,方便群众生活

鄂东南根据地建立前,三省边界的工业与商业已显颓势。由于国民党的繁捐重税和军事、经济的封锁,到1928年“黄石港的商家,在去年曾倒闭大店四十余家”,<sup>①</sup>根据地建立以后,以国营经济和商业经济为主体,从方便群众生活角度出发,鄂东南苏区政府对商店产业进行了合理的布局。“苏维埃商店要求县有总店,区、乡有分店;消费合作社要求不仅乡村要普遍建立,而且人员较多的机关、学校、工厂等也都要建立”。<sup>[9]105</sup>据鄂东南根据地商业方面记载,“除鄂东南苏维埃总商店外,还有布匹、南货、药材、肉食、粮食和油盐等分店。阳新县属的石港、三溪口、燕厦、八角亭、陈家祠堂、太平铺、杨林铺、伍家祠堂、辛排市、沙洲各处均设有县苏维埃商店的分店。大冶县的苏维埃总商店设在黄沙,另梅田、毛阳、杉木桥等处设有分店。在鄂东南基本苏区,消费合作社也有大规模的发展,几乎每村都有。”<sup>[9]106</sup>此外,鄂东南兵工厂设有工农合作社,由工厂工人和附近农户集资设立,负责“主要任务是收购本地的土特产运到白区去,再从白区把食盐等物品运到苏区来。另外,还经营一些与工厂工人和附近农民生活有关的货物。”<sup>[9]106</sup>在物资紧张的情况下,合理的商业布局 and 以实际情况为依据的商品经营理念,有效地为群众提供了紧缺生活用品等物资,受到了群众的广泛认可。

### 2. 改善经商环境,发展“对外”贸易

在鄂东南根据地发展过程中,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影响,曾在一段时间内,没收一切商品,取消自由贸易,限制各类小商品商人的经营,给根据地群众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后在中央与湘鄂赣省委的正确领导下,纠正了错误的路线与经济政策。湘鄂赣根据地负责人之一胡梓则呼吁:“要纠正无条件没收商人货物的行为,保障商业的自由,并要向白区商人宣布我们的政策,欢迎白区商人在不妨害革命的条件下,来苏区贸易,以改善商品市场的关系。”<sup>[10]</sup>苏维埃政府通过调整经济风向激发了商人经营的积极性,促使茶叶等土特产贸易至白区,并从白区引入食盐等紧缺物资至苏区,突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并优化了军民的商品供应结构。

虽然改善了商人的经商环境,但群众的需求仍然庞大,如何持续供应物资成为影响群众日常生活的重要问题,因此开辟物资输出和输入渠道成为改善群众生活和缓解物资压力的关键任务。在调整根据地内部商业政策的基础上,鄂东南根据地成立专门贸易机构转运局,直到1932年年初已有总局、县局、分局三级。下设土产部、外贸部、调查审计部、运输队与交通员等。<sup>[9]109</sup>各部门分工明确、职能清晰,其最重要的任务是:采取各种方式,打通赤白商业关系,发动群众进行转运工作,将土特产茶、麻、油、纸、煤炭、硝磺、鞭炮、竹木、兽皮之类输出,转运食盐、布匹、煤油、药材及其他一切需要品进来,以解决苏区日常必须品的困难。<sup>[9]109-110</sup>转运局下,白区商品由商人负责,根据地内商品由苏维埃政府负责并对缺乏资金私人商贩进行贷款。在政府支持下,商人常往来汉口及白军控制区的大冶、阳新等地贩货,布匹每次运回可达一二十担,总计一百多匹。苏维埃政府也努力与白区商人建立联系,进行贸易。如“大冶有个做苧麻生意的商会会长,从大冶湖运进苏区需要的物资,出售以后,就以货款在苏区购买苧麻,生意做得很大”。<sup>[9]110</sup>得益于正确的经济导向,鄂东南根据地在敌人的经济封锁下,商业贸易仍然异常繁荣,有效缓解了群众的物资需求压力。

### 3. 抑制物价,打击投机倒把

由于根据地内部长期缺乏各类物资,许多商人趁机提高商品价格,以布匹为例,“苏区布每尺三百多钱,龙港商家买来卖一串多钱一尺,农民要拿很多土产品才能兑换一尺布”。<sup>[9]111</sup>面对商人的投机倒把,鄂东南根据地政府要求“转运局与苏维埃商店,政府合作社,银行须密切的联系,关于土产和白区的货价均须定期互相报告,以便取到物价之联系”,<sup>②</sup>以此确保时时掌握物价动态,进行内部物价调控。商人方面,“白区商人也要号召他们‘前来苏府登记’,加强对他们的考查和管理”,<sup>[9]113</sup>确保他们了解并遵守苏区经济政策,避免随意抬高物价。对于食盐等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资,采取“食盐专卖”政策,并在特殊时机限制商品最高价格。同时,加强根据地内部的市场监管和商业规范,“实行小贩商业登记,现金出口仍略予限制,如确系购运去办货的现金,亦须报告当地苏维埃登记,以免反动分子将苏区的现金无故的搬运出口。”<sup>[11]676</sup>这些措施稳定了根据地内部的物资价格,有效地防止了资金外流,确保了地区经济的安全。

① 中共咸宁地委党史办公室:《鄂南党史文献资料:第一辑》,内部资料,1987年版,第275页。

② 中共咸宁地委党史办公室:《鄂南党史文献资料:第二辑》,内部资料,1987年版,第400页。

#### 4. 分配土地,打击地主豪强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土地革命为动力源泉,通过构建“农民阶级—农村革命根据地—土地产权”三位一体的革命范式,实施土地平分,确保农民能够享受更好的生活条件。针对群众土地需求,鄂东南根据地政府提出“要想根本解决吃饭问题,只有没收地主的土地”“没有饭吃的团结起来,反对土豪闭巢”和“要吃饭就要建立工农兵自己的政府——苏维埃政府”<sup>[12]25</sup>等口号,鼓舞群众勇敢的与地主进行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阳新县委员会2000余人,大打清乡委员,示威逮捕镇压反动派,取得了成功。大冶县游击队1000余人开展了“开仓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并打开了23个粮仓。<sup>[12]36</sup>在中共中央纠正“立三路线”之后,鄂东南根据地按照苏区中央局的指示重新分配了土地。在中央巡视员黄火青的指导下,提出了以下分配原则:这次分配在表面有些不同,主要原则为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田地,中农的田地退还,富农只按劳动力分坏田,富农剩余的田地及好田一律没收,分配时是按人口来分配,没有将劳动与人口混合起来分配,也没有平分一切的田地。但是执行退还中农的田地的不一定是退还原有的田地,是兼好歹的退还。<sup>①</sup>

为进一步深入土地革命斗争,使雇农、贫农群众享受革命果实。在鄂东南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苏维埃工作决议中提出:一、将分配给地主、富农和负责人的好土地收回。二、组织土地委员会彻底检查土地和耕具分配情况,发动群众斗争。三、将原保留给学校、桥梁、道路的公田立即分配给农民,已租地的收获按人口平均分配。四、未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区域(通城八县)应立即重新分配土地。<sup>②</sup>这一时期,鄂东南根据地的土地改革成效显著,以阳新县为例,在1928年到1932年间的三次土地改革与打击地主豪绅的过程中,四分之三革命根据地农民约50万人分得土地。<sup>[5]169</sup>

#### (三)文化教育实践中的群众路线

鄂东南根据地政府重视教育的普及与改革,将教育视为转变农民思想、根除封建迷信和提升政治觉悟的核心策略。通过构建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建设基础教学学校,进行基本的文化知识培训,成功传播了革命与社会主义的理念。

##### 1. 加强学校教育,培养革命接班人

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规定,苏区的教育目的是“以教育为阶级斗争的武器,造就无产阶级所需要的政治、经济、技术等专门人才,培养儿童有集体的思想、革命的热情、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健康的体魄、劳动的身手,投身阶级斗争,以推翻反动统治,巩固苏维埃政权。”<sup>[13]</sup>鄂东南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苏维埃工作决议强调:“加紧文化运动与学校建设,以最大速度提高工农群众文化政治水平。”同时,决议还要求“鄂东南及各县文化部,要在即派员下乡巡视学校,个别考察各乡小学教育程度,教授方法及教材,学校设备,儿童知识与要求”。<sup>③</sup>随着革命的深入,鄂东南根据地开办了多种类型的学校。以阳新县为例,1929年秋金龙区首次开设了列宁小学,并随后在各村镇普及列宁初小和高小。县级设有模范列宁小学,区级以下共设有高小6所和初小775所。根据地适龄儿童为5.15万人,入学率达60.4%。设置包括国语、算术、体操、唱歌等,同时还有劳动实习和社会工作课。教材由县政府编写,包括《红孩子读本》《苏区儿童读本》《列宁读本》等。<sup>[5]638</sup>鄂东南苏维埃成立后,迅速推动了文化运动和学校建设,重点提升工农群众的文化政治素养。阳新县的案例显示,通过普及列宁小学和高小,教育实现了广泛覆盖和课程多样化。同时,地方编写的教材体现了教育内容的革命性与实用性。总体而言,苏区的教育政策和实施有效增强了群众的阶级意识,为政治动员提供了坚实基础,并通过强调集体主义和合作精神,提升了根据地内部的凝聚力与团结。

##### 2. 重视社会教育,塑造群众社会主义思想

鄂东南根据地对成人教育的重视反映在其多样化的学校设置上。该地区以识字教育为主,成立了包括平民学校、农民夜校、工农补习学校、妇女半日学校及冬学等在内的成人学校。这一时期,鄂东南根据地的农民教育成果显著,如“龙港乡办夜校30所,学员2035人,占青壮年总人数91.8%。大湖乡办夜校13所,学员1660人,占青壮年总人数92.7%。”课本有《平民读本》《红五月纪念读本》《青年农民读本》等。<sup>[5]639</sup>同时,规定鄂东南苏维埃的教育经费开支由县苏维埃将部分税收划拨为教育基金,并从富农处募集义务捐,一定时期内将学校、桥梁和道路的公田收入纳入教育经费。<sup>[5]639</sup>鄂东南根据地的群众教育在塑造新的社会价值观和政治忠诚方面起到了核心作用。与群众路线紧密结合的教育,培育了一代深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此举不仅加强了群众与政权的联系,还确保了社会主义理念在基层的广泛传播和实践。

①②③ 中共咸宁地委党史办公室:《鄂南党史文献资料:第二辑》,内部资料,1987年版,第359—360页、第527—528页、第529页。

### 三、鄂东南苏区工农对政府群众工作的响应与贡献

鄂东南苏维埃政府通过群众路线的成功实践,塑造了与人民紧密相连的党和军队形象,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核心理念的实际成效。这一成就不仅是对群众生活的深刻理解和参与,而且反映了群众路线的实践在赢取地方群众理解与认同、促进革命力量快速增长及社会各阶级群众对革命事业参与度提高等方面的有效性。党员和红军领导人展现的平民化形象,突破了传统军队与民众之间的界限,展示了党员与传统官僚截然不同的群众形象,从而加深了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此外,群众路线的实质不仅在于军队形象与行为的改变,更深入地体现在政策与行动上。广泛的群众参与——无论是通过加入红军、捐献物资,还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支持行为——明确表明了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这种支持并非单纯源于对党的政策的认可,更重要的是基于对中国共产党作为真正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的事党的深刻认识。

#### (一) 积极入党,献身革命

鄂东南地区党组织通过实施蕴含群众路线精神的革命政策,使地方群众逐渐了解并认同中国共产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群众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工农群众普遍认为“不加入党则已,要入党就要入共产党”,<sup>①</sup>这是国共冲突中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可态度。尽管缺乏直接史料证明鄂东南根据地从建立之初到革命鼎盛时期党员人数的具体变化,但通过分析特定地区和时间节点上党员人数的变动,可以观察到鄂东南革命根据地党员人数的快速增长。以阳新和大冶为例,在蒋桂战争至秋收起义时期,阳新地区的党支部数量约为 80 个,党员人数则约为 770 余人。到 1930 年 4 月,该地区的党支部数量显著增加至约 180 个,党员人数亦相应增长至约 1800 余人。<sup>②</sup>大冶县秋收起义时期党员约为 70 余人,到 1929 年 5 月止,党员约有 480 多人,比一年前增加 7 倍。<sup>[14]</sup>而在总体单一时间节点党员人数来看,1932 年春,通过湖北省党的代表大会选举运动中的投票人数与投票制度得出,“阳新党员已发展到一万二千名左右、大冶、通山三千六百名左右、咸宁一千二百名左右、鄂城二千名左右、武宁一千六百名左右、瑞昌一千二百名左右,加上蒲圻、通城、崇阳、嘉鱼等县的党员,整个鄂东南地区共有党员约三万名左右。”<sup>③</sup>党员人数的快速增长反映了党组织在该地区党政工作的有效实施及地方工农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信任度的逐渐加深。

鄂东南地区不仅呈现出党员人数快速增长的显著特征,还呈现出社会各阶级群众参与革命事业的不断深入。阳新县大岷镇小学教师,知识分子阮文莉烈士,通过观察贫苦工农生活,受党教育后成为妇联主任。她白天教书,晚上参与革命活动。在土地革命期间,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审讯时回复敌人:“我是教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联主任,没有什么讲的”。就义时仍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sup>④</sup>此外,通山县大垅口地区王翠红烈士,自幼丧父被卖为奴隶,后成为劣绅儿子的妾。1929 年,她积极参与党的革命活动,成为石门妇女会领导人,并于 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翠红以自己的经历为动力,组织编唱革命歌曲,号召妇女反抗封建制度。1933 年,她在保卫苏区的战斗中负伤被捕,面对敌人威逼不屈,于 11 月英勇就义,享年 22 岁。为纪念她,石门乡后更名为“翠红乡”。<sup>⑤</sup>在国民党反动派持续的政治高压下,鄂东南地区的党组织始终坚信并依靠群众,因而深得工农爱戴。在这一时期,党员数量的快速增长和各阶级群众的积极参与革命工作,不仅补充了革命力量,而且扩大了革命斗争的范围。这表明了群众对根据地党组织的坚定信任和爱护,以及他们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 (二) 参军入伍,保卫苏区

面对国民党的持续围剿,鄂东南根据地的军事力量逐渐减弱。为捍卫苏区政权,工农群众积极加入红军。1931 年 8 月,鄂东南特委在《中共鄂东南特委目前工作计划决议案》中提出:“不论在苏区与非苏区,须尽可能的普遍的建立工农武装,必须号召广大劳苦群众及中农真正志愿的参加赤卫队、少先队、游击队等。……地方工农武装,须取消从前一切五花八门的名称。凡十六岁以上二十三岁以下的劳苦男女群众,都编入少先队,二十四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的劳苦群众,都编入赤卫队。不论纠察队、赤卫队、少先队中最积极、坚决、强壮并志愿的成分,都编入赤卫军或游击队。”<sup>⑥</sup>这一方案得到了根据地群众的积极响应。在大冶县刘仁八

①②⑥ 中共咸宁地委党史办公室:《鄂南党史文献资料:第二辑》,内部资料,1987 年版,第 30 页、第 31—36 页、第 245—246 页。

③ 湖北省革命史资料编写组:《党在湖北地区革命斗争史资料:第四分册》,内部资料,1961 年版,第 76 页。

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通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通山文史:第五辑》,内部资料,1991 年版,第 14—16 页。

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通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通山文史:第一辑》,内部资料,1987 年版,第 151—153 页。



村,彭德怀军长曾在此休整部队,为了扩大兵源,除张贴布告外,彭德怀军长亲自在司令部门前桂家巷的密林里召开征兵动员大会。在他的动员下,许多贫苦出身的青壮年农民踊跃报名参军,仅刘仁八附近的马对于村一次就有二十多人应征入伍。大冶县前后参加红军的达1万余人,正如彭德怀军长在“自述”中追忆的:“八军大多数是阳新、大冶人。”<sup>①</sup>在大冶县马对于村,有挖山地打开山锣鼓、大家唱和的风俗,彭德怀军长曾在此带领当地村民唱歌:“婆婆表了态,我把红军爱,劝夫革命当红军,挖掉反动派!”<sup>②</sup>得益于根据地人民投身革命事业的热情,鄂东南苏区军事实力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到一九三二年四月,地方红军扩大三倍以上,约三、四千人,警卫团和地方武装扩大一倍以上。”<sup>③</sup>

### (三)捐粮捐物,共度时艰

鄂东南根据地群众路线的有效实施,不仅体现在群众积极参军的社会响应,还表现在对物资的支持上——通过捐献粮食和物资以支持红军。这一系列行动反映了广大群众对红军严明军纪的认可,以及对红军作为人民军队的逐步支持和拥护。在支持和拥护红军方面,鄂东南根据地的人民是湘鄂赣根据地中最为积极的群体。在通山县南洞村的后方医院,“先后医治伤员达二百来人,村民帮助医院挖草药,送鸡蛋给伤员调养,体现了深厚的军民鱼水之情。”<sup>④</sup>在《中共湘鄂赣省委关于妇女运动决议》中也曾提及,鄂东南地区妇女群众热烈拥护红军的场景,“领导妇女拥护红军。鄂东党对这一工作的注意,所以妇女热烈拥护红军,在红军去时,同红军洗衣、补衣,送果品等给红军吃,所以红军接受其拥护,热忱勇气因而提高,卒能战胜敌人。”<sup>[11]1048</sup>1933年11月,湘鄂赣省委组织了全根据地的革命竞赛,据统计,在湘鄂赣省革命竞赛活动中,鄂东南根据地的人民总计捐赠鞋子4000双、草鞋8000双、草药200元、袜子2000双,鄂东南苏区各县平均慰问红军医院3次。<sup>[11]1056</sup>这次革命竞赛活动中,鄂东南捐赠物资数目位列湘鄂赣根据地第一,物资捐赠基本是其他根据地3—4倍,这些都体现了鄂东南苏区深厚的军民鱼水之情及群众对于革命事业的拥护。

鄂东南根据地的群众不仅积极捐献粮食和物资支援红军,还在红军经过苏区村落时,主动参与军事行动,有效协助红军取得了多次军事胜利。1929年秋,红五军第五纵队进驻鄂东南地区,在九宫山地区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人民奔走相告,“彭德怀领导的红军回来了!”红军所到之处,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各村群众腾房子,送粮草,组织洗衣队,补衣队,歌咏队慰劳红军,还主动为红军站岗放哨,侦察敌情,争当红军向导。在九宫山地区群众的支持下,红五纵队全歼厦铺、宝石等地的保卫团(民团)“常练队”。<sup>⑤</sup>10月下旬,通山县县城被攻破,红军将大量物资搬至九宫山地区,创建了鄂东南红军兵工厂、红军医院和红军被服厂。鄂东南党建企业的创建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支持,许多青壮年都参加到了红军的事业中。1983年10月,原红五纵队党代表何长工、第二支队支队长程子华谈起这段往事,都满怀深情地称赞说:“没有九宫山区人民的支持,没有通山老区人民的支持,就没有我们红军的胜利,也没有革命的胜利。”<sup>⑥</sup>

### (四)朴行立信,党心连民心

土地革命时期,鄂东南根据地党与军队的形象建设达到了极高标准。其中,骨干党员亲民的表率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仅提升了党在政治、社会及军事各方面的形象,而且巩固了党的权威和群众基础。1930年5月,彭德怀率军抵达大冶山乡襄城里,受到群众热烈欢迎。众人听说的彭军长骑着高头大马,抵达时骑着大马的却是一位“病号”。在人群中,一位身着补丁满衣、草鞋、头戴灰布帽,背铁锅的同志随队前行。直至炊事班战士称呼其为“彭军长”,百姓这才惊觉其身份,纷纷称奇:“我们以为他是个伙夫呢,原来是个军长,共产党的官不像官。”<sup>⑦</sup>正是通过群众口口相传,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得到成功塑造,从而深化了人民对革命政权的支持。这种看似无意的行为不仅增强了根据地群众对党组织的信任,还巩固了对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真正属于群众、致力于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形象,为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 四、总结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宣传党的理论和政策,树立了早期党组织及军队的良好形象,提升了苏区群众对革命事业的热情,促进了反帝反封建革命事业的不断深入,营造了群众、党员、军队三位一体的优良政治生态。鄂东南党组织在制定各种政策时秉持为民服务的初心,成功开创了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的

①②⑦ 大冶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大冶文史资料:第二辑》,内部资料,1987年版,第31页、第37页、第35—36页。

③ 鄂东南党史编写小组:《党在鄂东南地区革命斗争史》,内部资料,1986年版,第137页。

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通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通山文史:第四辑》,内部资料,1990年版,第20页。

⑤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通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通山文史:第六辑》,内部资料,1995年版,第57页、第58页。

新篇章,为党的群众路线工作的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

鄂东南根据地群众路线的工作实践揭示了鄂东南党组织工作的核心原则:首先,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其核心要求是党的所有工作必须立足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恪守“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原则。其次,通过深入群众、紧密联系群众的工作方式,党能够更加精准地把握群众的需求和期望,进而制定与群众利益相符的政策和措施。最后,强调群众路线在人民群众中培育党的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通过党的领导与群众的自我管理相结合,共同推进革命建设事业的持续进步。群众路线的实践在当时为根据地的建立和维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后来党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理论基础。群众路线的实质在于,党的所有工作必须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最高标准,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党确保了其政策和行动始终与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利益保持一致,从而在复杂的社会变革过程中保持了党的先进性,获得群众广泛支持。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62.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26.
-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四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83.
- [5] 湖北省阳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阳新县志[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
- [6] 中央告诚工人书(续)[N].大公报;天津版,1928—10—24(02).
- [7]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 [8] 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湘鄂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M].南昌: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办公室,1996.
- [9] 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上册[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 [10] 胡梓:加强领导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和纠正过去右倾“左”倾的错误[N].红旗(中共湘鄂赣临时省委机关报):第二期,1932—04—25(02).
- [11] 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下册[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 [12] 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中册[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 [13]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三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41.
- [14]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宜春地区史料征集办.湘鄂赣苏区史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41.

责任编辑:吴斌

## A Study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ss Line in the Southeastern Hubei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WU Qinghua, HU Yangle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 4350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core area of the Hunan-Hubei-Jiangxi Revolutionary Base, the Southeastern Hubei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though established relatively late, became the most stable strategic rear of the Hunan-Hubei-Jiangxi Base through its flexible application of the mass line.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the Party organizations in the Southeastern Hubei Soviet area won widespread recognition from the masses and accelerated revolutionary progress by implementing practical policies such as fostering strong party-people relations to mobiliz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revolution, developing the local economy to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s, and prioritizing mass education to cultivate revolutionary ideals. These efforts laid a solid popular foundation for advancing the revolution. This practical approach demonstra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ass line in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and provided an exemplary case for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and Revolution; Mass Line; Southeastern Hubei Revolutionary Base Area